



1931年7月12日清晨,南京的中央医院住院部门口,三三两两的记者一边说话一边伸长了脖子往里看。住院部的铁门此时紧闭,两位身强体壮的便衣守在门内两侧。看来,医院住进了不寻常的人物,会是谁呢?报童嘹亮的声音揭开了谜底:“看报,看报,《印铸局长周仲良女公子昨在国府持刀自杀》,现正在中央医院接受治疗……”

这天上午七时,国府秘书兼印铸局局长周仲良出现在中央医院住院部门口,等候多时的记者一哄而上,随即被周的随从拉开。周仲良随后点名光华社独家采访。第二天,一篇题为《周映辉女士自杀后生命尚无危险 其父周仲良昨赴医院探视》的报道出现在《中央日报》上。那么,周映辉为何要自杀,而且偏偏把地点选在国民政府,这其中究竟有何内幕?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

国府内的一桩家庭纠纷血案

■谁的胆子这么大,竟敢在国民政府内举刀自杀?

■高官的家务事,政府能帮他理清吗?



上世纪30年代的中央医院,即今天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



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,即今天南京人俗称的“总统府”

妙龄女郎血染国府

1931年7月11日上午七点,位于今长江路292号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号房(注:即今传达室)里,出现了一位妙龄女郎。她眉头微锁,双唇紧闭,脸上隐隐显出一股怨气。号房里的警卫很有礼貌地上前询问,女郎表示,她想见一见国府的秘书长叶楚伦。随即,女郎按照警卫的要求,认真地填写了会客单。在会客单“求见理由”一栏里,女郎用娟秀的笔迹写下了求见叶楚伦的理由,大意是:因为生母早逝,父亲续了弦,她就和继母生活在一起。继母脾气恶劣,为人阴险,很善于做表面文章。在别人眼里,继母知书达理,而实际上,自己长期在家里受到继母精神上的虐待,有苦说不出。如今,自己再也不能忍受,于是,就想到了叶楚伦,希望请国府这位德高望重的秘书长给做个主。

警卫放下会客单,很认真地告知女郎,像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,不属于秘书长的工作内容,换句话说,叶楚伦不会因为这点

小事,抛开手头的工作来专门接见你。因此,不能放行。听了警卫的话,女郎神色悲切,再三央求,希望警卫能够通融。拗不过女郎的哀求,警卫只好将会客单和女郎的名片递交到秘书处。

女郎一直在号房里来回地踱步,情绪看上去十分激动。她不停地朝国府内瞄上一眼,迫切的心情显而易见。过了一会儿,警卫回来了,说,秘书处有请。女郎疾步来到警卫身边,跟着他穿过弯曲的回廊,来到秘书处的办公地点。然而,让她失望的是,接见她的,不是秘书长叶楚伦,而是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看出她情绪的波动,就建议和她边走边聊。一路上,女郎都在强调自己想见的是叶楚伦。工作人员好言相劝,说,清官难断家务事,这事就算秘书长来了,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况且,秘书长事务繁忙,真的抽不出时间来。在国府的大礼堂前,女郎停下了脚步,很认真地问:“叶秘书长真的没有时间来见我?”工作人员点



叶楚伦

头。女郎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锋利的裁纸刀,抵住自己的咽喉处,说:“那我这样了,他还来不来?”说完,她就猛然用利刃刺向自己的脖颈处……

秘书处工作人员呆若木鸡,看着痛苦地蹲伏在地的女郎,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,大声呼救。此时已到了上班的高峰时间,国府各处的职员正纷纷到府办公。听闻呼救,一起聚集到大礼堂前。有职员细细一看,不由惊呼一声,怎么会是她?!

和继母矛盾恶化走上极端

接到国府职员打来的电话,周仲良连忙赶到现场,周映辉随即被国府医官处派人用帆布床抬到中央医院医治。周仲良在手术室外不安地等待着。幸运的是,经过手术治疗,周映辉的情况稳定下来。医生说,裁纸刀具没有刺破喉管,性命应该是无忧的。而刚从病房出来的周映辉脖子上裹着白白的纱布,表情极为痛苦,不停地呼痛,音调极其微弱。见女儿无生命之虞,周仲良松了口气。

面对闻风而来的各路记者,周仲良解释了女儿自杀的原因。

周仲良的女儿周映辉今年二十一岁,性格十分刚烈,之前她与父亲的关系还不错,但自从周仲良续弦之后,父女俩就日渐生疏。最让周仲良苦恼的是,女儿周映辉和继母势同水火。“她和继母之间发生的三场纠纷,或许就是她自杀的导火线。”

这第一场纠纷是,周映辉想进入学校学习,其继母没有立即答应。继母的理由是,时局较乱,家里的住宅位置也没有最终选定,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说。虽然后来,周映辉顺利地进入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钟南中学上学了,但继母一开始的阻挠却让她时时如

鲠在喉。

这第二场纠纷是,周映辉还有一个弟弟,叫周东生,为继母所生,当时正在大行宫小学读书。继母经常带着他去紫金山爬山,去玄武湖游玩,一有时间就陪着他去看电影。每次去的时候,继母总是弄得人尽皆知,就像是故意做给周映辉看的。周映辉总觉得继母是故意在欺负自己,更觉得心中难受。

至于最近一次的纠纷,也可以说,就是导致周映辉自杀事件的导火线。事发前几天,周映辉要出席一位关系较好的同学的婚礼,需要添一身新衣服。因为平日里周仲良忙于工作,这些家庭琐事都是由妻子负责,所以周映辉只好开口向继母索要购衣费用。继母表示可以代为购买。周映辉其实早已看中了一套。但继母却以费用较高为由,买了另外一套。周映辉十分不满,和继母争吵起来。继母随即就离家,去了亲戚家暂住。而周映辉也随即前往在立法院工作的叔叔家。

如此看来,周映辉和继母的矛盾由来已久,而买衣事件是她自杀的直接原因。那么,让人不解的是,她从她掏出裁纸刀刺向自己的喉咙来看,她到国府自杀系有备而来,那她为何一定要选择到这里来呢?

自杀者的父亲曾经救了一县百姓

聚集的人群一起望向那位发出惊呼的职员,“她,她不是周仲良周秘书的女公子吗?”这句话,更是引来了人群的一阵骚动。那么,周仲良是何人?记者随即向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教授求教。张教授告诉记者,周仲良其实算得上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。他是贵州黎平县人,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,曾出任孙中山总统秘书、北伐军第十路军党代表等职。而能够让他在史学上留下一笔的,就是他印铸局局长的身份,因为他是中华民国国玺的督制者。

据介绍,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济棠派人去缅甸,寻到了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,花了9500块大洋,将其购回。经玉石专家鉴定,这是块稀世珍宝,国民政府决定以此制成国玺,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,让其负责刻玺工程。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,自己亲自督制。这块玉玺从1929年10月10日开始使用。而周仲良也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。至于周在其他方面,张教授则表示,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,所以留下的资料也非常少。

而贵州省黎平县委志办公室的时甘诚告诉记者,说起周仲良,其实他对黎平县还有一定的贡献呢,正是因为他,民国时期

的黎平县躲过了一次轰炸。

时甘诚介绍说,民国时期,贵州黎平县长谢仲良密令各村寨农户偷种鸦片烟,还默许当地土豪杨锦标种大烟。平民百姓都知道种大烟是杀头之罪,于是,有少部分人就联名向贵州省政府控告谢仲良违反禁令,开放烟毒的罪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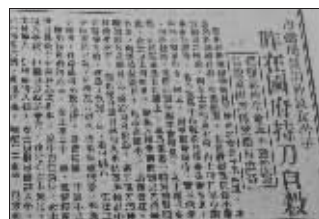
于是,国民党省政府电令黎平县政府组织人员进行调查,查铲烟苗。因是县长令种的大烟,只得敷衍了事。但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”,省府派保安司令张策安为专员,带领保安队到黎平进行武力铲烟。结果,张策安接受了谢仲良的贿赂,瞒天过海,遂呈文上报“黎平并没有种大烟”。但他的保安团却不听使唤,兵分两路,一路强行铲烟,一路攻打杨锦标,到了最后,保安团趁火打劫,逢人就开枪,见财物就抢。

杨锦标也在一天夜里反攻黎平。幸好,城中百姓没有逃跑习惯,乱枪之中,百姓们只是从床上移铺于地上躺卧,以避免流弹。全城仅一陈姓孤寡老人持灯开门而被击毙。攻入县政府后,县保警大队长张配先,开枪自击腿部,以推卸其责。县长谢仲良束手就擒,专员张策安从政府后面逃出,钻入菜园,亦被活捉。几经交涉,多方周旋,双方达成协议,

张策安下令撤退铲烟部队,杨锦标退还所缴枪支,礼送专员出境。黎平禁烟一事不了了之。

此事发生后,贵州省政府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,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,欲派飞机轰炸黎平。而身为黎平人的周仲良,则找到蒋介石,据理力争,认为轰炸黎平必定会害无辜百姓受难,实在不妥。蒋介石也就打消了念头。

只是,作为国民党元老,周仲良的家庭生活并没有表面上的风光。时甘诚告诉记者,虽然县志上并没有关于周仲良家庭的介绍,但因为解放后周仲良回到了黎平,所以,现在当地的一些老人还依稀有点印象。周仲良有一儿一女。女儿周映辉系前妻所生,儿子周东生是续弦所生。1931年7月11日在国府大礼堂前自杀的,正是其女儿周映辉。那么,周映辉为什么会自杀呢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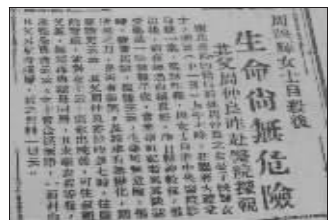
1931年7月12日,《中央日报》报道了国府内发生的这起血案

选择国府自杀是为了让父亲难堪?

《发现》记者详细地阅读了《中央日报》上的消息,发现了一些端倪。

报上说,周仲良因听闻女儿周映辉“声言要自杀”,所以“予就将妻女均接回家中,极力劝解,不料今早伊竟出此一途也。”可见,不知周仲良是如何劝解,反正被接回家后,女儿的怒气不仅没有消下去,反而“噌噌”地往上冒。

从周映辉与继母的具体矛盾的表现上,可以看出,周映辉的胸并不宽广,“用句俗话说,她是典型的‘小心眼’。”听了《发现》记者对这一自杀事件的讲述,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方文分析说:“周映辉也完全有可能是父爱饥渴症,因为父亲在续弦前,她和父亲关系较好,父亲再婚后,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继母身上,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满足她的心理需要。对她而言,父爱缺失了。那么,造成自己父爱缺失的祸首是谁呢?是继母,所以,她就将怨气转向了继母,一开始就对继母抱有成见,一点小事都与其针锋相对,造成双方关系紧张。而这次父亲把她们两人都从外面接回家后,劝慰时,可能更偏向其继母,导致了她把一腔怨气全部转向父亲。谁能给父亲制裁呢?也只有父亲的领导了,那么,



1931年7月13日,《中央日报》刊出记者采访周仲良的稿件

到印铸局肯定行不通,她父亲就是局长,那就只好去国府找秘书长叶楚伦了,因为他是作为秘书的父亲的头头上司。”于是,周映辉的身影出现在了国府。

而对于周映辉身揣利刃的行为,方文认为,这就是极端性格的表现。她想用最坏的结果来“惩戒”父亲对自己的忽视,让他后悔,让他难堪。“就算周映辉见到了叶楚伦,她还是会掏出那把裁纸刀的。”方文说。

那么,周映辉达到她目的了吗?1931年7月13日的《中央日报》上,光华社记者发文说:“其父周仲良亦于昨晨七时,往医院探视,并对女士(记者注:指周映辉)云:伤愈出院后,可住叔叔家,无须再与继母同居,其求学衣着等费,当完全负责云云。女士当含泪无语。”